

明清科场作弊漫谈

周伟华

自隋代采取科举取士制度之后，科举中第成为众多读书人最高的人生目标。到明清时期，科举制度日益完善，而科场作弊也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
明清科场作弊的形式多样，五花八门。最常见的是夹带，又称怀挟。据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二二二记载，乾隆九年（1744年）顺天乡试，乾隆帝派亲近大臣前往监看，结果头场“竟搜出怀挟二十一人。或藏于衣帽，或藏于器具，且有藏于褰衣裤中者”。到了第二场，“贡院门外，抛弃蝇头小卷，堆积于墙阴路隅者，更不计其数”，甚至还有把挟带“含于口颊，而搜检时，咽入腹中者”。乾隆帝极为气愤，发出“其丧心无耻，至于此极”的感叹。盛怒之下，乾隆帝下令裁减全国各省的乡试名额。考生的夹带手法也是多种多样，且极为隐蔽。《清稗类钞》对夹带作弊有这样的描述：“入场者，辄以石印本小本书济之，或写蝇头书，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，并以所携考篮酒螯与砚之属，皆为夹底而藏之，甚至有帽顶两层，靴底双屈者。更或贿赂皂隶，

冀免搜检。”由于夹带需要特定的器具，因此滋生了一种专门制造夹带器具的行业。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年），在四川成都，官府就查出许多制造夹带器具的商铺。这些商铺根据考生的需要，或制作双层毡帽，或制做挖空的石砚，等等，品种繁多，制作手法也十分专业。

请人代考是一种很常见的作弊形式。请人代考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直接让人冒名顶替入场进行考试。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一四一二中记载，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，江西省兴国县童生刘昌新，雇请自家的私塾老师广东嘉应州人黄超扬入场代考，并许诺谢银六十



江南贡院明远楼

两。因年龄相差较大，黄超扬还特意“雇须入场”。另一种是把请人代做好的试题设法传入场内。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卷三四 中叙述了场外请人代作文字是如何传入场内的。考生买通外场巡逻的兵役和考场内的差役，用砖石等物将考题掷出场外。场外的枪手把题做好后，或点起灯笼高挂在竹竿，或鸣放爆竹，或将驯养的鸽子系上铃铛放飞，通知场内的考生到预定的地方来接取已做好之题。由于传递试题方法巧妙，连道光年间任广东巡抚的刚毅也发出感叹：“富儒意图幸进，竟预倩枪手数人，藏于隐僻之处，得题分作，片刻立成，即飞进场中，其巧捷有不可思议者。”

贿赂官员以疏通“关节”，是科场作弊案中影响最坏的一种形式。《水窗春呓》卷上叙述了清代道光年间科场中贿赂官员盛行的情况：“京师关节之风甚炽。凡翰、詹、科、道、部员中有考差可望分房者，亲友相率送条子，以圈识之，每一圈为百金，有多至三十圈者。亦有京官自送条子与公车者，得隽后如放外官，望纳年例。相习成风，恬不为怪。装成小摺，携带入闱，各房互

相寻觅，即黏蓝批鼎荐。俟关节中满，始得认真阅卷。以故虽素负文名之帘官，取中亦鲜佳卷，其精神全注条子故耳。”

科举考试作弊不但形式多样，而且工具制作十分精巧，作弊手法极其隐蔽。在北京图书馆就藏有清代科场上使用的两件作弊工具。一为特制的15块黄绢。这15块黄绢分别长43厘米，宽42厘米，抄录内容丰富，约有40万字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它的第一块黄绢为整个抄本的目录，而且每块目录有编号，利用它可以十分方便快捷地检索到其余14块黄绢抄录的资料。另一件为写满蝇头小楷的衣衫。这件上衣里外两面都密密麻麻地抄满了科考的范文，总计353篇，约有20万字。另外隐蔽的作弊手法也令人防不胜防。如受贿赂的阅卷官员和考生约定好，在试卷上使用特定的几个字，以便阅卷官员准确地识别考生的试卷，从而达到作弊的目的。湖南人欧阳兆熊在《水窗春呓》中记载自己亲身的一段经历。道光年间，欧阳兆熊赴京会试，与他关系很好的某侍御一天特意叫他到家诊病。看病结束后，这位侍御



藏匿于鞋中的手抄本



只有火柴盒大小的手抄本



科场上用于作弊的衣服

写下“也欽圣怀”四字，叮嘱他把这四个字嵌入文章的末尾和诗中的抬头两处。欧阳兆熊婉言拒绝了这位侍御的好意，结果未能及第。

为防止科场作弊，主持科举考试的当政者也绞尽脑汁，想了诸多办法。首先在考场设置方面极为严谨。清末武昌人刘禹生所著《世载堂杂忆》中对乡试考场的安排有详尽的描述：“乡试考场曰贡院。头门前大牌楼书‘辟门吁俊’，左牌楼书‘明经取士’，右牌楼书‘为国求贤’。贡院头门曰龙门，大堂曰至公堂。达大堂甬道中，建高楼，曰明远楼。大堂最后进曰衡鉴堂，主考与同考官居之。堂前墙门垂帘，奉调阅卷者曰内帘，不阅卷而在考试场中执事者曰外帘。阅卷官及其随从人员不得出帘外，执事官员人等不得入帘内。故同考官公馆门首，大书‘调帘回避’。帘以内，内监试主之；帘以外，外监试主之，关防至为严密。”《清高宗实录》中提到，对修葺贡院的匠役人等都要严格搜查，才准放入考场进行施工。主要是防止士子贿赂匠役们，将与考试

有关的资料事先埋藏到考生进行考试的号舍内。另外对于号舍外用于巡更的巷道，由于比较偏僻，容易隐藏外来人员，也砌起墙垣，禁止闲杂人等来往。

其次对考生穿着的衣物、所用考具、所带物品都有严格的规定。乾隆年间就明确规定：考生衣物，“帽用单层毡，大小衫袍褂，俱用单层。皮衣去面，毡衣去里。裤裤绸布皮毡听用，止许单层。袜用单毡，鞋用薄底，坐具用毡片。其马褥厚褥，概不许带入”。考生考具，“卷袋不许装里，砚台不许过厚，笔管镂空，水注用磁，木炭止许长二寸，蜡台用锡，止许单盘，柱必空心通底”。考生所带的食品“糕饼饽饽、各要切开”，用来盛物品的考篮也“编成玲珑格眼，底面如一，以便搜检”。甚至考生夜间应试所用蜡烛，为防止里面有夹带，统一使用官府配给的官蜡，只不过费用要考生自行承担。

对于考生的入场搜查也极为严格。明末艾南英在《艾千子自叙中》就叙述自己参加院试时遭遇严格搜查的情景。考试那天，天气十分寒冷，考生站在门外等待点名和搜检。搜检开始后，考生要在寒风中敞开衣襟，接受二名军士“上穷发际，下至膝踵，保腹赤踝”的严格搜检。由于天气寒冷，考生都冻得“齿震悚栗，大都寒沍不知为体肤所在”。不但院试如此，乡试的情况更是严格，“至入乡闈，所为搜检、防禁，囚首垢面、夜露昼曝、暑喝风沙之苦，无异于小试”。由于艾南英科场不顺，曾多次参加考试，也因此备受搜检之苦，

难怪他发出感叹：“为诸生者二十年，试于乡闈者七年……备尝诸生之苦，未有如予者也。”

不但对于考生检查严格，对于参与监考、阅卷工作的官员的任命与工作程序也有严格的规定。明清时期，主考官的品级逐步提高。明末林时对所著《荷牖丛谈》卷一，载有明代主考官的任命情形：“成化十五年御史许进请各省布政司亦如两京例，命翰林官典试。弘治十四年，礼部右侍郎谢铎亦有是疏，章下所司，俱未允行。至嘉靖戊子、辛卯，各布政司乡试，始俱命选京官二人主考，后遂为例。”到了清代，对于入闈的考务官员实行了严格的回避制度。入闈官员应自行开列应回避考生的姓名，不准该考生参加本科乡会试。如果不主动开列姓名而自己的亲属又被录取的考务官员，除自己要被革职查办外，该生所获得的功名也要被取消。

因责任重大，参与乡会试的官员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。《世载堂杂忆》记载了各种参与科考官员入闈情况，很值得玩味：“入闈例乘显轿，八人舁之，朝衣朝冠，无顶篷，如赛会中之迎神。显轿只监临、正副主考坐之，余如监试、同考官，皆乘八人、四人轿，用全副仪仗开道。最妙为轿后随抬盒一具，载腰斩所用之铡，亦即清廷对主考犯科场大罪之刑具。此种刑具，闽省科场案，曾一用之。主试者被腰斩为两截，心未死，伏地以舌书三大‘惨’字而毙。巡抚具奏，始罢此刑。然以后主考入场，仍用此具文。”上述史料表明，

参与科考的官员既享有无上的荣光，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，轿后随抬的“载腰斩所用之铡”时时警示着他们要秉公取录，否则就有被腰斩之虞了。虽然后来此刑因过于残酷而被弃用，但此种仪式仍然保留着，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。

还曾有担任考务工作的官员因压力过大，精神高度紧张而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。按大清科场条例，外帘不用墨笔，主要是防止胥役人等营私舞弊而设，后经修改的科场新例则规定监临官用紫笔。据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一八九载，初任广西巡抚不久的李世杰，在闈中任监临时用紫笔给乾隆帝写了一摺奏章，被乾隆帝笑为太过拘泥，并告之“各省巡抚入闈，遇有奏章，无不用墨笔缮写者”。无独有偶，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任江西巡抚的海明也犯了同样的错误。海明因此遭乾隆帝申饬：“在外任已非一日，宁于此尚未之知。乃尔拘牵冒昧，竟以素不经见之式率形奏牍耶？何不晓事体若此！”如果说李世杰还是因初任巡抚不了解情况，那么为什么海明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呢？较合理的解释，可能是这些担任考务官员的各省巡抚大员，精神高度集中，办事小心谨慎，生怕一不小心出了什么漏洞，结果却偏偏闹出了笑话。

这些巡抚大员紧张的心情却也不是庸人自扰，因为对于科场弊案的处罚是极为严厉的。据《清世祖实录》卷一一一载，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正月颁诏大赦天下，跟科场有关的两项

罪行“阅卷有弊、科场作弊”，竟然与“谋反、叛逆”等十恶不赦之罪并列，不在大赦范围之内。由此可见，对于科场弊案处置的严厉。

尽管明清两代对科场作弊一再重申禁令，但作弊之风却是禁而未绝。究其原因，当时人们对待科场作弊的态度，应当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。明代凌濛初的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卷四十所叙述的几个有关科举的故事，有助于我们探讨明代人们对科场作弊的态度。其中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何姓举子，到京中应试，在酒店偶遇一伙性情相投之人，畅饮一番后尽兴而归。几日后，何举子见一人醉卧路旁，细看原来是当日酒店同吃酒中的一人，于是好心把他扶起。那人稍微清醒点后，从袖中掏出小纸封交给何举子，让他回去好好细看。何举子回住处打开后，发现原来是几道会试试题，同住举子都不信其为真，只有何举子与另一名安姓举子，不论其真假，当做练习，每题都认真准备。结果入场后，他们发现会试的六个题目都在当中，何举子与安姓举子皆得登第。其余几个故事模式与此大同小异，皆为应试举子得到鬼神相助，或事先得到试题，或于试场中得到别人做好的答卷来抄袭，或答卷并不出色而因神灵相助而受到阅卷官员的关照，等等，最后都出乎意料地及第。稍微揣摩一下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故事中人物之所以能及第，都与科举作弊有关。对于这些凭借作弊手段而获得成功的举子们，小说的叙述者对他们的遭遇赞叹不已。虽然是小说所记，

但应该是有所本，它至少表明普通民众对科举作弊的认同态度。到了清代，参与考试的士子对此也“恬不为怪”了。乾隆初年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励宗万，就奏称“夹带文字之弊”，“始惟旗人北人间或有之，今则江浙等省相率效尤，即素称能文之士亦乐其便安，转相仿效……始犹觉其可耻，惟恐人知，今则公然谓之家伙，父子师弟衣钵相传，恬不为怪”。

也正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，人们千方百计寻找关系，以求疏通科场的“关节”。由于科场作弊大有市场，因此也滋生了一种专以寻求科举作弊为手段的骗术。明人张应俞所著的《杜骗新书》中就专门把与科举有关的骗术归为一类，名“买学骗”。书中写道：“凡学道出巡各处，棍徒云集追随，专体探富家子有谋钻刺者，多方献门路，以图蛊骗。或此路不售，后一帮又生一端以投，年年有堕其术者。”正是富家子中有大量“谋钻刺者”，所以棍徒才会云集追随，而且上当受骗之人为数众多，“年年有堕其术者”。

随着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，人们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动，心态越来越浮躁，能真正静下心来读书的人也越来越少。科举作弊作为一种省力而又快捷的成功之法，自然深受人们的追捧。由此，我们可以说，明清以来科举作弊之风日盛，与当时人们对科举作弊的认同心态有莫大的关系。

作者单位：南昌大学历史系